

第一章 文明的兴衰

一、“新罗马”

经过了 6 年时间，君士坦丁皇帝终于使他梦想中的“女郎”出现在欧洲的东端、亚欧交界处的波斯普鲁斯海峡一隅。随后，皇帝举行了盛大的迁都仪式，许多廷臣、元老和显贵们都接受了皇帝的邀请随驾东迁（但不是全部），意大利的罗马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为了强调自己建立的城市是罗马帝国的新都城，君士坦丁皇帝宣布此城为“新罗马”。在这里，城区格局和全部建筑物几乎完全都按照罗马的模式：古罗马城以其七丘而著称于世，君士坦丁堡在建成以后也将其城区划分为七个地区，称之为“七丘”，在此基础上划分出 14 个区。因为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七个山丘，于是，所谓的第七丘就坐落于拜占庭城外的金角湾上。君士坦丁堡的第十三区置于金角湾的北部，以便与罗马城“跨越台伯河”的城区相对应。罗马城的政治中心“卡匹托丘”是罗马城的第二丘，君士坦丁堡城也将第二丘取名为“卡匹托丘”，将政治中心设于此地。罗马城的皇宫位于马克西姆竞技场旁，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也与竞技场毗连。罗马城有一个别名为“弗洛拉”（Flora，拉丁文“花朵”之意），君士坦丁堡也取了个希腊别名为“安苏萨”

(Anthusa , 希腊文 “ 花朵 ” 、 “ 繁荣 ” 之意) 。甚至于连城市的管理体系和巡夜、消防组织的人数都与罗马城相同。君士坦丁皇帝还仿照罗马时期的样式修建了豪华的元老住宅, 以使他的臣僚们感到自己像是在 “ 罗马城 ” 的家中一样。虽然在东方这座新都城中真正懂得拉丁语的人不多, 但是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者们长期保留了拉丁语的官方语地位, 直到查士丁尼颁布了《罗马民法大全》之后, 希腊语才成为正式的法律语言。因此, 在整个中世纪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臣民们长期被笼罩在 “ 罗马帝国 ” 的光环之下, 并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迁, 东西方世界正在走上不同的道路。甚至直到帝国的末日来临, 拜占庭皇帝和他的臣民们还不肯放弃 “ 罗马 ” 这一名存实亡的称号。沧海桑田, 风云变幻, 朝代更迭, 拜占庭的历史在君士坦丁之后又延续了 1000 余年。但是, 各代皇帝都不肯放弃恢复地中海大一统帝国的幻梦, 并将它传之于后世。直到近代, 欧洲各国的君主们还常以 “ 恺撒 ” 自称, 以称霸整个欧洲为荣, 如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俄罗斯的沙皇、保加利亚的 “ 沙皇 ” 、法国革命后期的皇帝拿破仑等。

君士坦丁皇帝之所以选择在亚欧交界处的拜占庭建立新都, 无疑有多方面原因。首先, 罗马帝国经历了 3 世纪的大危机后, 奴隶制已面临全面崩溃。在帝国的大部分统治区域内, 隶农制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帝国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罗马帝国西部的奴隶制大庄园多已瓦解, 固守罗马古典时期传统的旧的元老贵族们多已屈服于皇权的优势, 一些顽强的反抗者早已被皇帝们无情地镇压和消灭了。来自农村和山区的行伍出身的军人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占居主导地位, 一些人甚至登上皇帝的宝座。旧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念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传统的罗马国家宗教、对太阳神和朱匹特神及其神族的崇

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脱胜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思想，凭着它超民族、超种族、超阶级的普世性，凭着它追求人类普遍之爱和惟一真神——上帝之爱的理想，凭着它在冷漠残酷的现实世界上对来世和天国之真福的描述，在帝国的广大土地上迅速传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甚至于连达官贵人和宫廷佳丽、皇室成员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于是，象征着罗马共和传统和昔日辉煌的古都罗马城已经丧失了其往日的魅力，随着罗马世界帝国危机的发生和意大利城的衰落，那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皇帝们，常常愿意避开罗马城这个过于古典气的城市，长期在东方各城市的行宫中居住。这种倾向似乎在恺撒时期已经十分明显，到了 3 世纪危机以后更为突出了。戴克里先实行了四头改革以后，就把自己的长期驻节地定在帝国的东方，尼科米底城（*Nicomedia*，今土耳其伊兹米特，*Izmit*）一直是他的重要行宫。

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是古老的传统文化的繁衍地。这里的民族曾经有过多个大帝国统治的记忆，人们将皇权和神权混为一谈，总认为皇帝是天之骄子，理应成为平民的统治者。因此，他们对于罗马由共和到帝制的改变并不感到大惊小怪。另外，近东的松质砂土和干旱的气候条件，适于在生产工具不甚发达的时期进行最原始的、以二圃轮换休耕制为特点的农耕，建立起了虽然贫困、但人口却十分稠密的农业区，“它能够维持环绕地中海东岸从亚历山大到塞萨洛尼基半圆形内的大城市。当这一地区由于瘟疫和第 3 世纪的混乱而受到严重破坏时，它有能力相当快速地使之重新建设起来”^①。近东地区也从未建立起发达的奴隶制，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共存是这一地区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11 页。

的主要经济特点，因此，这一地区没有感受到 3 世纪危机的更多冲击，在国内战乱基本平息之后，便迅速地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尽管这里也经历了商品经济的衰落和工商业贸易活动的萧条期，政府也曾采用征收实物税和以实物发放军政官员和士兵俸禄的方式来供养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军队。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在 4 至 5 世纪之交，国家已经基本恢复了经济的往日繁荣，工商业活动也能够正常进行了。因此，一方面是东方的经济繁荣养育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这座新的都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都的建立和帝国统治中心的东移，使东方具有的优势有了更大幅度的发展，其经济文化的繁荣也很快为世人所瞩目。不久，拜占庭城就成为亚欧大陆上最为繁荣昌盛的都市。

当代拜占庭研究学者们根据该城市粮食进口的记载对其人口进行了粗略的估计，在早期拜占庭时期，至少在 6 世纪大瘟疫以前，其城市人口可达 50 万至 100 万。还有几个数据也有助于加强人们对该城市的规模的了解：按照罗马国家供养自由民的传统，在 4 世纪初的君士坦丁堡，每天向平民供给的面包份额大约是 8 万份，后来该定额不断被突破；在查士丁尼于 532 年镇压尼卡起义时，贝利撒留的军队在竞技场内一次就杀害了 3 万余人；在 542 年至 543 年发生于亚非大陆交界处、后来蔓延到整个欧洲的大瘟疫流行的高峰时期，君士坦丁堡一天的死亡人数达 5000 至 1 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街头无人处理的死亡者遗体达到 30 万之众。当时，幸存的人们还在城外挖了不少埋葬死尸的巨大壕沟，每个壕沟内可埋葬 7000 具尸体。^① 上述看来过于悲惨的数据，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君士

^① 转引于柏立：《晚期罗马帝国史》第 2 卷，多佛尔出版公司 1958 年版，第 65 页。

坦丁堡有着庞大的城市人口的历史事实。

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当时是全帝国的行政中心，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在全国各地有密如蛛网的大小驿站，皇帝可以随时将他的政令迅速传至罗马世界各处。在拜占庭统治的东方帝国，皇帝手中掌握着一支相当庞大的信使团。据记载，在 5 世纪，该信使团大约有 1250 人。他们不仅是信使，也作为皇帝和执事长官的间谍，随时监视着各地地方官员的敬业情况。当有特别紧急或机密的通知时，皇帝则派出他的书记员、传令官、宦臣或宫廷卫士充当信差。一般地，在帝国大小官道上，每隔 12 英里的距离就有一处驿站，各驿站随时为来往信差提供快马和骡子。在紧急情况下，信件或文件发送的速度很快。例如，在 418 年，罗马教区主教人选矛盾，罗马市的市政长官西马库斯 (Symachus) 立即向米兰城的西罗马皇帝霍诺留 (Honorius) 发出书面汇报 (12 月 19 日)。霍诺留的批示于 1 月 3 日到达罗马，西马库斯按令执行后，于 1 月 8 日写了回函。在一般情况下，由米兰发出的文件、信件、敕令等，在 3 周到 6 周内可到达罗马。一项于 4 月 11 日在米兰签署的法令，在 5 月 9 日就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法令，在横跨地中海的长途跋涉后，于 3 个月后可以到达帝国西部的哥尔多瓦。有一次，皇帝在西尔米乌姆 (Sirmium，今南斯拉夫米特罗维察，Mitrovica) 签发的敕令，仅用了 1 个月时间 (4 月 17 日到 5 月 18 日) 就到达了北非的迦太基 (Carthage)。但在更多的时候，由帝国欧洲部分 (如在米兰或巴黎) 发出的文件，要经过 3 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北非。尽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各类文件送达的速度受到影响，但是，皇帝们还是通过他们的官僚机器和信使网络，比较成功地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中央集权统治。

君士坦丁堡还是东方基督教会的中心。在君士坦丁之前，罗马历代皇帝对于基督教基本采取排斥和怀疑态度，直到 311 年，罗马的东方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才宣布基督教徒可以有信仰自由，并允许他们从事宗教崇拜活动，但由于他很快去世，结果这一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君士坦丁继承了伽列里乌斯的政策，在他攻克了米兰城后，与他的同盟者利西尼厄斯（Licinius）会晤时，他发布了给予基督教徒以信教自由的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通常被称为“米兰敕令”（313 年）。^①从此，该“敕令”成为罗马帝国皇帝承认和接受基督教的标志，君士坦丁皇帝也因此被基督教会奉为“第十三使徒”和圣者。人们将君士坦丁皇帝的画像供奉在基督教教堂中，以纪念这位给予基督教以真正合法地位的“第一位”罗马皇帝。从此，基督教的地位扶摇直上，发展成罗马——地中海世界的惟一正统宗教，古典地中海世界的传统宗教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着君士坦丁皇帝的迁都，拜占庭的基督教会一跃而成为该城宗教生活的核心和精神领袖，由引起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罗马和耶路撒冷等早期基督教会不满。4 世纪以后，许多大规模的宗教争论在几个大教区中开始展开，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东西方文化矛盾的冲突，但在相当程度上则反映了各大教区的大主教争夺基督教世界最高交椅的矛盾和冲突。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毕竟是天子脚下的第一人，在皇权的扶持下，他们很快获得了同罗马平等的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罗马，成了除罗马教皇外所有东方教区的主要支配者。当然，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始终没有摆脱皇权的阴影，这决定了东方基督教会（东正教会）一直处于皇权的助手和附庸的地

^① 参见徐家玲：“试论米兰敕令的误区”，《世界中世纪史新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1 页。

位。

君士坦丁堡城的政治、宗教地位也使它成为全帝国文化生活的核心。作为帝国的首都，这里荟萃了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优秀学者、法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时期，这里建立了在皇权庇护下的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425年）。在这里，有着来自罗马世界各地的优秀的语法学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等。国家还规定了相应的考试制度，招纳和聘请有声望的学者到各类学校任教，请他们到首都翻译注释古代典籍。这里学术风气浓厚，上自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把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及罗马军事、法律和自然科学放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4至5世纪之交，皇帝、教士、修士，甚至大街小巷的平民百姓都热心参与关于基督教教义方面的争论。平民们在经营浴池、商店和进行交易活动时，津津乐道地谈论宗教问题，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①6世纪的著名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一个出身于伊利里亚（Illyricum）山区普通农民家庭的青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其舅父的庇护下，接受了当时最正规的高等教育，成了通晓拉丁、希腊两种官方语言，熟知律法和宗教哲学乃至兵法和军事的杰出政治家。在查士丁尼主持编写《罗马民法大全》时，以特里波尼安（Tribonian）为首的10位帝国著名的法学家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将浩如烟海各类罗马法律资料和论著的精华部分整理和出版（《法典》10卷本，529年），向后人展示了查士丁尼时代法学家们的深厚功底和敬业精神。

拜占庭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很好地利用了海洋。由于它

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第1卷，第79~80页。

地处亚欧商路上的重要位置，由此控制了红海、黑海、地中海、多瑙河、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岸的许多贸易口岸；其陆路联系也四通八达。来自东方各国的丝绸、香料、黄金、珍珠和各种奢侈品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些商路运进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大小城市。在君士坦丁堡城区内有着巨大的商业区，汇集着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珍奇货物。街道上不同肤色、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口音的各国商人熙熙攘攘；集市上，来自不同地区的特产琳琅满目；金角湾内，停泊着来自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地的大小船只和来自埃及的运粮船。帝国的金币是当时亚欧世界最常用的国际货币。在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各地，手工业生产始终兴旺发达。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是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重要都市。这里的工厂生产优质的毛织品、麻织品、丝织品和金属制品、珠宝制品、瓷器和玻璃等。其中有些产品，如叙利亚的玻璃、珐琅制品，精细呢绒等远销至中国。

因此，自君士坦丁大帝确立拜占庭城为帝国的新都以后，罗马帝国的东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其政治、经济、宗教地位扶摇直上，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东方帝国”——拜占庭帝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随着罗马帝国的西方半壁江山在“蛮族”入侵的大潮中化为废墟，东地中海区却保持了长时期的繁荣昌盛。因此，相当一部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统一整个罗马帝国的年代（324年），是拜占庭文明形成的起点。自然，君士坦丁皇帝在帝国的东方建立“新罗马”，并不是想使帝国走向分裂，而是想使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中心。但是，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在如此庞大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维持东西方的统一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而且罗马—拜占庭帝国内部一直保留着两种基本语言：在西方是拉丁语，在东方则是希腊

语。“拉丁语的背后没有思想上的活力，它没有文学和科学能使它成为才智之士所必需的东西，而维持其凌驾在希腊语之上的地位。”而“进取性的语言必须提供礼物，希腊语的礼物之丰厚远远超过了拉丁文的礼物。”^①因此，尽管在伊利里亚（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山区）西部的拉丁化地区，包括高卢（即后来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地区长期保留着拉丁文化的传统，但在巴尔干半岛以东的地区，拉丁语在希腊语的挑战面前不得不“退避三舍”而让位于希腊文化，拜占庭皇帝们也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原来亚历山大帝国的遗产（东地中海希腊化地区），它的语言、文化、宗教、政治也越来越东方化、“希腊化”了，东地中海地区恢复了希腊文化的传统地位。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最后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拜占庭一地中海罗马帝国最后也演变为中世纪的希腊化帝国。

与此同时，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各个地区，拉丁语发生了各种变异，演变成中世纪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达契亚和下麦西亚地区的拉丁人和当地居民的后裔，发展起来了中世纪和近代的罗马尼亚语。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带来的是各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独立发展，而东方罗马帝国的残存，却带来了希腊文化的复兴。然而，这时的希腊文化表现出一种退化的、迂腐的、庸俗的仿古特征，但它毕竟用其特殊方式保存了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遗产，因此，它的存在和发展仍然有其重要价值。

所以，自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罗马——拜占庭帝国在保留其罗马帝国之政治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开始了向中世纪拜占庭的过渡，4至6世纪就是其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

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页。

二、古典世界的末日

著名西方史学家韦尔斯曾经谈论过 4 至 6 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特点：“这个帝国体现了一种比罗马更古老的传统。如果读者能看看……地图上它在 6 世纪时版图的方圆，如果他能想想这里所述及的只是名义上的罗马帝国的一支；它事实上是希罗德多德所梦想，亚历山大大帝所创立的希腊化的帝国，它的确自称为罗马，称它的人民为‘罗马人’直到今天，近代希腊语就称为罗梅克语。君士坦丁大帝也的确不懂希腊语，查士丁尼的希腊语音调不正。这些名义上和形式上的肤浅事物都不能改变帝国实际上是希腊文化的这个事实……真正的罗马帝国经 4 个世纪之久完全崩溃以后，这个希腊化的‘罗马帝国’仍继续保持了 11 个多世纪……”

当然，君士坦丁时期，拜占庭这个直接承袭了罗马传统的专制帝国还有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了拉丁文明的优势。大约经历了两个世纪之久（4~6 世纪）的风云变幻，帝国才基本确立了希腊化的发展方向，进入了其历史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又经历了大约两个世纪（7~9 世纪）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帝国才进入了真正的希腊化的中世纪帝国发展阶段，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9~11 世纪）；随后，拜占庭帝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是，拜占庭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却始终沿着前代已经奠定的希腊化的道路发展着，为近代希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基本条件，也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准备了一个现成的古典文化艺术的宝库。

上述的第一个历史时期（4~6世纪）是亚欧古典世界历史上的特殊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亚欧草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向西方大举迁徙，引起了亚欧大陆上激烈的民族冲突，干扰了古典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中国，当时正是三国两晋的封建混战时期和北方民族大规模地南侵；在印度，白匈奴人的入侵结束了笈多王朝在北印度的统治，造成了北印度小邦林立、封建混战不断的局面；在波斯和中亚，大月氏人占领了波斯人的领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在欧洲，则是匈奴人的入侵推动了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在东南欧和西欧的迁徙，从而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西方各支“蛮族”小国的崛起。“蛮族”入侵的大风暴之后，东方各支文明（中国、南亚、西亚波斯）又按照其以往的传统，回到了原来的发展轨道上。而地中海罗马世界却在激烈动荡中分崩离析了：在“蛮族”入侵的狂潮中，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相对强大的东方皇帝们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在进行顽强的军事抵抗的同时，也采用了狡猾的外交手段，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敌人引向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属于西罗马帝国的领地上，从而缓解了自身的压力。于是，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蛮族”入侵者却建立了一个与罗马世界完全对立的新的世界，发展了与古典文明完全不同的中世纪文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古典时期的残余物，又继续顽强生存了约1000年。

然而，拜占庭并没有一成不变地保留古典时期的遗产，而是对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系列巨大的变革。

在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方面，奴隶制的集约化经营方式让位于以隶农为主体的小农租佃式生产方式，国有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4世纪以来迅速发展，在查士丁尼时代（6世纪）已基本完成；在意识形态方面，传统的罗马多神信仰经过人们失望

的挣扎，最终被基督教的一神信仰所取代。但是，基督教会内部的争论，却成为令帝国政府十分挠头的问题；在王权理论的发展上，罗马帝国早期的“君权取之于民”的传统原则逐渐让位于“君权受之于天（上帝）”的原则；在语言文化方面，东地中海地区各民族使用的主要语言希腊语逐渐取代了罗马帝国官方语拉丁语的地位，成为帝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在民族和国土疆域方面，由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基本上被“蛮族”人建立的王国所盘踞，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新罗马）帝国，只余下了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半岛以东、黑海沿岸、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埃及等地区，其统治区的人民基本是希腊人和已经希腊化的或仍然保留着本民族传统的近东各族人民。

首先，在经济形态方面，4至6世纪正是罗马地中海帝国转型的重要时期。3世纪危机之后，奴隶制的大庄园在罗马帝国的东西方都面临着瓦解。由于帝国统治的近东和埃及地区这类大庄园数量不多，如埃及的奴隶数量仅占全埃及人口的2%至7%，因此，3世纪危机没有给东地中海地区带来更多的损害。在广阔的城乡，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在4世纪中期以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君士坦丁实行的货币改革为东罗马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城市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很快使东方帝国富裕起来。与此同时，农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4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庭皇帝将其手中控制的大面积皇室地产强行出售，使一大批官僚元老贵族成为新兴大地主；另一方面，善男信女们的馈赠，也使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大为发展。在这些新兴的大地产上，隶农和经济地位与之相似的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劳动者。为了在这一新的条件下保证国家的税收，使农业劳动者能将他们的劳动果实及时送进

国家的财库，戴克里先实行了著名的“轭一丁”制改革。在该项制度下，每一块土地都与相应的劳动者人数相对应，即每“轭”（两牛一轭一天耕种的土地面积）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丁为一个征税单位。这种措施的目的在于使每一块土地都有人耕种，每一个耕地者都为国家纳税。国家还采用强制性移民和屯兵的办法来加强对边境地区荒芜土地的开垦和对边境的防卫。在 4 至 6 世纪，拜占庭东方边境的戍民主要是哥特人，6 世纪以后主要是来自黑海北岸的斯拉夫人。这种移民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国家的税收和财政，使帝国在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的打击下能够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保证了国库贮备充裕富足。

在宗教领域，君士坦丁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后，整个罗马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凭着它的普世性逐渐取代了罗马的传统多神教崇拜，成为帝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但一神教取代多神教的斗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异教势力十分顽固，它不仅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在上层统治集团中也有雄厚的势力。因此，君士坦丁皇帝虽然承认了基督教，却并不急于接受基督教洗礼，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也是在临终时才接受基督教洗礼，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① 此后的几代皇帝虽然极力支持基督教发展壮大，但却没有正式放弃自图拉真之后一直为罗马皇帝所独占的罗马大神朱庇特的“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之头衔，直到狄奥多西和他的共治者格拉先时期（379 年）才宣布放弃这一头衔。^② 即使如此，在查士丁尼时代，异教的势力仍然十分顽固，查士丁尼所任用的大法官特里波尼安和著名历史学家、大将贝利撒留的随军秘书

琼斯：《古典世界的衰落》，朗曼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9 页。

伯里：《晚期罗马帝国史》第 1 卷，多佛尔出版公司 1958 年版，第 368 页。

普罗科匹厄斯都是所谓的异教徒。但是，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在基督教的胜利和异教的衰亡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君士坦丁皇帝的侄子朱利安（361~363年在位）复兴异教活动的失败。

朱利安是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一任皇帝。他的父亲与君士坦丁皇帝是亲兄弟。其父母早亡，幼年时他受过严格的古典教育，对他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一位导师是著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学者马尔多尼乌斯（Mardonius）；著名的阿里乌派主教（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犹西比乌斯（Eusebius）是他的圣经教师，因此，他同时接受了古典哲学和基督教的经典教育。虽然他年轻时已经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但他骨子里却是完全的“异教”徒。他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只是为他提供了一层保护自己真实信仰的外套。在君士坦提乌斯（337~361年在位）掌政后期，这位皇帝害怕自己家族的兄弟觊觎自己的皇位，将有资格继承自己皇位的亲属都杀害了，朱利安是惟一的幸存者。于是，朱利安的整个青年时代都笼罩着死亡和恐怖的阴影，被君士坦提乌斯随意调遣。他时而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省份，时而被调进帝都受到严密监视。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止朱利安在流放地研习古典希腊文化巨著。当时著名的修辞学者、希腊化运动的代表、卡帕多细亚人利巴尼乌斯（Libanius）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在他的同父异母兄长伽卢斯被君士坦提乌斯杀害后，朱利安被流放到雅典，更多地接触了柏拉图的学说。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狂热地恢复古典宗教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①

公元 355 年，君士坦提乌斯正式封朱利安为恺撒，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并使朱利安去高卢抵抗步步进逼帝国领土的

日耳曼人。朱利安在阿根托拉图姆（*Argentoratum*，即今施特拉斯堡）取得了对日耳曼人的胜利后，驻军于塞纳河上的小城卢特提亚（*Lutetia*，今巴黎）。他以自己的赫赫战功，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君士坦提乌斯担心朱利安的权力太大，于 359 年冬天命令他率领其最好的兵团向波斯前线增援。朱利安的士兵拒绝接受这一命令，他们将朱利安抬在盾牌之上，宣布他们拥护朱利安为奥古斯都，这预示着一场新的内战就要爆发。恰逢君士坦提乌斯在从波斯前线回军途中去世，^①朱利安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帝国承认的奥古斯都。

朱利安成为帝国主宰之后不久，就立即把他恢复异教崇拜的梦想付之实施。他颁布了法令，宣布异教神庙必须全部开放，人们对众神的献祭活动也必须恢复。但是这时的君士坦丁堡已经没有异教神庙，一些献祭敬神活动只好在教堂进行。朱利安的倒行逆施，引起许多人的反对。但朱利安不以为然，顽固地实行自己的既定政策。他十分清楚，在基督教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自己不可能完全恢复那些已经被铲除的异教神庙和神像以及祭拜仪式，他必须使异教崇拜仪式能与基督教的崇拜仪式相竞争。因此，他将基督教中的许多组织原则引入多神崇拜中：他按照基督教的教阶制指定了异教众神祭司的级别，按照基督教教堂的内部装饰模式装饰他的罗马众神殿，将基督教在会堂内讲经传道的方式引入罗马多神崇拜中，甚至将基督教中信众们唱圣诗的传统也引入了异教崇拜中；他还要求异教神殿的祭司们像基督教主教们那样过禁欲的生活，违背圣规者也以开除教籍作为最重惩罚。总之，他所致力于恢复的罗马多神崇拜，实际上是基督教化了的异教。

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第 1 卷，第 70~71 页。

异教的祭拜活动需要宰杀许多牲畜和小动物，耗费了国家刚刚恢复不久的经济力量，引起了一些崇拜异教众神的人们的指责。朱利安皇帝亲自参加本应由祭司们做的宰杀牲畜的工作，也被历史学家们不无贬义地记载下来。朱利安在即位之初，就打出了宗教宽容者的旗号，发布了一些敕令，召回原被君士坦提乌斯流放的基督教异端派。他还实行了鼓励人们脱离基督教会的政策，以种种特权诱惑人们脱离基督教会，瓦解基督教会的力量。不久，基督徒们就被排斥于他们本来工作的政府部门之外，君士坦丁时期制定的军旗符号（上有基督二字的希腊文字头）被取消不用，士兵们盾上的十字符号也被异教众神的符号所代替。最后，朱利安下诏取缔了基督教参与教育工作的资格，他认为，这些不信仰古典宗教的人们，无权在课堂上讲授荷马和赫西俄德、德莫斯蒂尼、希罗德德等人的作品。这就等于宣布，在帝国范围内担任教师者，如果不放弃基督教，将失去其基本的生活来源。^①而且，基督教徒的子女也不会去这样的学校念书。因此，这一举动不仅受到了基督教徒的抵制，一些异教学者，如阿米亚努斯·马赛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等，也对此颇有微词。之后，一些为基督教徒学龄儿童使用的启蒙教材问世，由此在拜占庭文化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朱利安的倒行逆施在近东各省人们中引起了更深的的不同，这在他于 362 年视察东方各省时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位皇帝处处受到冷落，没有看到他想像中的鲜花、仪仗队，也没有歌声和欢笑，只是在他即将拜祭的安条克城郊达福尼（Daphne）阿波罗神庙前，有一位祭司怀抱着一只从他自己家里捉来的

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第 1 卷，第 70~71 页。

鹅，在等待着皇帝的光临。①不久，即发生了达福尼神庙失火事件，朱利安忍无可忍，开始改变其对基督教徒的宽容态度，下令关闭各地的教堂。安条克的基督教堂内的珍藏被洗劫一空。帝国境内的其他教堂也遭到厄运。与此同时，基督教徒也组织起来破坏异教殿堂，形势变得日益严峻起来。不久，朱利安在向波斯远征的途中被一支投枪夺去了性命。

朱利安死后，他所致力恢复的异教也无人再去扶持，基督教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朱利安恢复异教活动的失败深刻地证明了历史已经前进，社会已经发展，任何以一种行将死亡的意识形态来挽救世界命运的倒行逆施者都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古典世界的灭亡和基督教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基督教会内部的斗争却伴随着基督教的胜利发展起来，于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三、罗马末世的辉煌

查士丁尼时代是晚期罗马世界即早期拜占庭帝国的最后阶段。经过 4 至 6 世纪的演变，东方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胚胎已经在旧世界的母体中发育成长，查士丁尼时代则使这一系列发展达到了一个“质变”的临界点。从拜占庭的全部历史来看，7 至 8 世纪的历史巨变显示出“希腊”文化和东方基督教文化相融会的更大的力量，其“希腊帝国”的特点也更为成熟。然而正是查士丁尼时代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才奠定了拜占庭这个“希腊化中世纪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基本模式。因此，查士丁尼是使古典的罗马帝国向中世纪

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第 1 卷，第 73 页。